

郭沫若研究 系列

王锦厚 著

郭沫若学术论辩

成都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晓明

封面设计：张光明

版式设计：何 华

郭沫若学术论辩

王锦厚 著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十二桥街60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75插页：6 字数：200千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0575—071—8/Z·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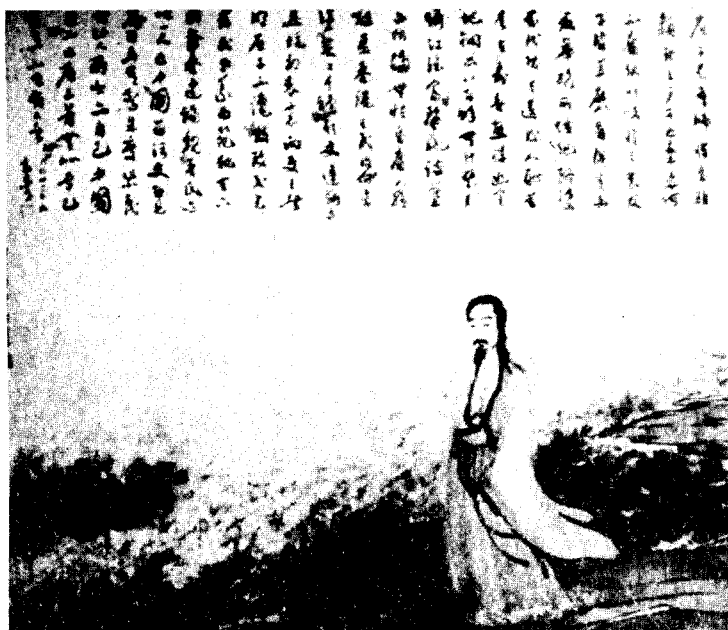
定价：4.20元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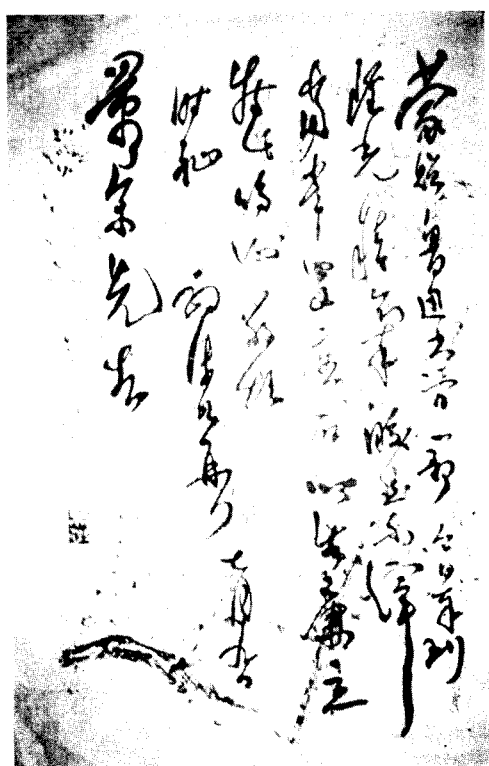
1.

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亚碎叶城。
 (唐本传述：李公) (唐代宗初年宗任翰林在任道于时李白的已故) 出外见范传正《翰林李太白新墓碑文》。新墓碑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在李白死后三十四年。其文有云：
 “公名白，字太白，大宛城西人。绝嗣之宗，难索谱牒。公之孙女授于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王族叙行，纸坏字缺，不能详悉，约而补之，陈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宗家于碎叶。族裔数高，温姓最名。”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其二为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大略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碑文既标明“隋末”，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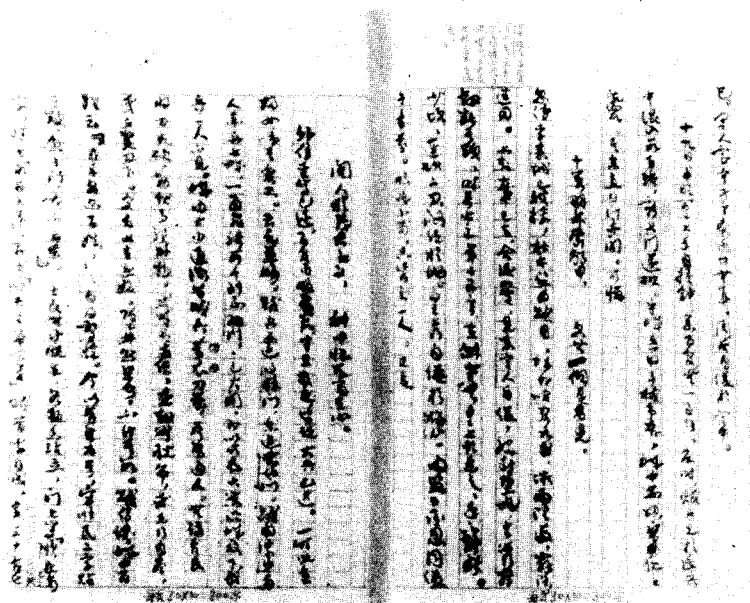
《李白与杜甫》影印手稿



郭沫若题、傅抱石画《屈子行吟》



1937年7月9日郭沫若致许广平



郭沫若校勘、标点、抄写的《剿闯小史》手迹

「郭沫若研究系列」出版缘起

顾炎武曾批评：“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好为人序，亦如好为人师，确为文人通癖。本社推出“郭沫若研究系列”，原想不声不响陆续出台。然而，同行者相告，现在时兴锺锣鞞鼓打广告，默然不语将影响发行，对作者与读者都不利。出版社位处中介，自不能不顾及作者与读者两位“上帝”。再者，也确需向广大读者朋友坦呈编织这套系列的原因。鉴于古有“好为人序”的告诫，今有“作序成灾”的弊病，本社终不敢以“序”自命，权且名之曰：“缘起”。说一说缘之所由，还是必要的。

郭沫若是巍峨的高山，是浩瀚的大海，是影响现代文化史甚巨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他笔耕一生，著作等身，存世文字达二千万言以上，内容兼及文、史、哲、考古、民族、文字、语言等众多领域，茹古涵今，贯通中西，文体类型几乎应有尽有。这些文字代表着现、当代中国文化学术的高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他革命一生，经历了变幻多彩的社会政治活动，留下了葱茏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对我们党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郭老的人品、文品，蕴含着挚爱中华的精神。郭老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自觉地将小我溶入中华大我之中，从善如流，唯真理是求。他既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身体力行的革命的弄潮儿。他曾长期飘泊海外，但从不失一颗赤子之心，始终爱着中华，爱着伟大而古老的民族，爱着我们伟大的党。他的言论、行为、著述无一不在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自尊、自重、自强的中国人，怎样做一个促进中华振兴的中国人。他身上所体现的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深邃的研究精神，永远照耀着我们创造性地开拓学术文化新领域的道路。

为着弘扬民族文化，为着振奋民族精神，我们需要

从郭老遗留的这些精神财富中，开掘取之不尽的宝藏。需要对郭老的方方面面加以分门别类、条贯系统的研究。需要学习郭沫若，认识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建立“郭沫若学”，如同《红楼梦》之有“红学”一样。

尽管“郭学”的建立和发展，也许需要漫长时间的跋涉，但我们愿以此共为黾勉。

本此初衷，我社与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的同志们多次商谈，认为“郭学”研究，目前虽有专门学会和刊物，专著亦复出版不少，但还缺乏专门系列的研究丛书。在他们的指导、支持和赞助之下，克服经费拮据的困难，我们开辟了这块名为“郭沫若研究系列”的小小园地，为“郭学”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

本研究系列分为三辑：第一辑为学术研究，第二辑为创作研究，第三辑为资料编纂。三辑不分先后，分别出版，不求大而全，但望新和美——观点、论据、表述方式要新，心灵、人品、文品要美。不求其全新、全美，至少要有一新或一美，皆可入选本研究系列。希望广大“郭学”爱好者能喜欢，祈望多给指导和扶持。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与郭老的巨大成就相比，我们这套“研究系列”仍嫌单薄而不够份量。然

而，“有”比“无”好，积少可以成多，汇聚点滴终能成大海。我们立足于此时此地的条件，心想着未来的发展。假如全国、全世界的“郭学”爱好者对我们的努力能引起关注和心谊，那么，将来也许不可估量哩。

“岷山毓秀，沫水钟灵”，西蜀是郭老的故乡。郭沫若这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铸成的巨硕之果，胎出于我们西蜀。西蜀文苑珠林，在扬、马、李白、三苏之后又增一瑚璉瑰宝。也可以说，郭老是中华文化，也是巴蜀文化发展数千年而结穴于廿世纪的宁馨儿。没有蜀乡悠久的历史传统，就没有郭沫若。作为郭老家乡的出版社，奉献一块学术园地，使“郭学”研究工作者有用武之地，应该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尽管成都出版社是全国最年轻的出版社之一，自知稚嫩绵薄，但如果从成都作为中国和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来看，它又具有古老悠久的编辑出版历史的天然优势，有潜在的条件和能力为雨后春笋般的郭沫若研究专著当助产士，分一份忧，为“郭学”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有这样的自信。

勉贡芜辞，是为缘起。

成都出版社

1990年6月

目 录

“郭沫若研究系列”出版缘起

我是怎样认识郭沫若的·····	1
《郭沫若批判》与抗争·····	11
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13
人生道路的正确抉择·····	45
鲜明的对照·····	68
《甲申三百年祭》的风波·····	93
先从《中国之命运》出笼说起·····	96
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100
驳姚雪垠的种种非难·····	119

屈原研究的启示····· 143

把屈原研究作为古代社会研究的继续····· 145

把屈原研究与实际斗争当作一回事····· 163

把屈原研究与创作密切结合····· 187

《李白与杜甫》的得失····· 202

从宣布烧书到重新写书····· 203

作一番比较之比较····· 210

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234

杜荃到底是不是郭沫若····· 260

先来一个简单的比较····· 262

再来一个简单的比较····· 269

一些粗略的考察····· 274

几句结束语····· 282

最后几句交待····· 284

附录一

少年郭沫若“偷桃”的对联是假的····· 289

附录二

一本有益于鲁郭比较研究的好书····· 292

我是怎样认识郭沫若的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考古、思想、政治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他所走过的道路，他所从事的斗争，他所处的地位……几乎都很特殊，同时，也很典型。

郭沫若的著作，就是他多方面斗争的记录。当然，只是一部分斗争的记录，还有相当丰富而复杂、难苦而困难的斗争事迹、经验教训，有待于档案材料的公布，日记的公开，书信的出版，佚文的搜集、整理。就是已经或即将出版的38卷本《郭沫若全集》，也需要花极大的力气，下极大的苦功，联系这些著作产生的时代，联系郭沫若全人去进行研究，才可能做到真正理解，从而认识真正的郭沫若。

那么，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样去认识郭沫若呢？

我以为：

一、必须从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观点去看

郭沫若首先是以诗人的面貌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五四”运动中，他带领着被世人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青年驰骋文坛，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很快，又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到革命运动的战线，从此，便一直以诗人的素质从事政治思想斗争，从事学术研究，从事文艺创作。周恩来同志说：

“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虽然有些论据，还值得推敲。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①

^①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见1941年11月16日重庆版《新华日报》。

应该承认，这是对郭沫若其人其书的一个深刻而准确的概括。郭沫若是富于战斗生活的，从他跨入历史舞台，一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不仅是在北伐、抗战、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伟大的时代，是站在斗争的前线，便是在60年的文化生活中，也都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就总体而言，郭沫若完全可以誉为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典范。不容讳言，从局部看，有时是存在矛盾的，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以诗人的气质去从事政治和学术工作，一方面使他特别富于感情，另一方面也免不了有缺少冷静的地方；以革命行动家的动机去从事创作和学术工作，一方面固然使其著述特别富于战斗性，另一方面，有时也难免将学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过分加以强调，以致缺乏科学性。他曾经这样说过：

“我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究竟有无效用。个人的吃饭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换句话说，便是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假使白费地写作一些无意识的文字，这写作本身就是一项罪恶。”^①

用不着过多的注释，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写作是为了宣传“意识”，“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无疑，

^① 郭沫若：《反正前后·发端》，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8月版。

这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今天，它还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又特别强调“政治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就未必完全正确了！特别是当我们的政治出现“左”或右的干扰，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的时候，把政治价值凌驾于创作和学术之上，其结果，创作和学术也会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危害。这种“危害”之作，在郭沫若的创作和学术活动中是存在的，应给予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但就总体而言，郭沫若的创作和学术都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而写成的，是非常注意社会效益的。我们决不能把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郭沫若割裂开来，那样，郭沫若就不成其为郭沫若，郭沫若的著作也就不成其为郭沫若的著作了！

二、必须从向古董挑战，与政敌以及革命内部的不同意见论战的一贯风格去看

郭沫若一生确实充满了战斗生活。他的特点是素来富于反抗精神，好做翻案文章。当然，这种反抗，好做，是随着人生阅历、知识积累、思想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成熟的。

郭沫若一生进行过无数次挑战与论战。如：向蒋介石的公开挑战，向胡适的不断挑战，与陶希圣之流的长期论战，与廖平等屈原否定论、弄臣论的反复论战，为曹操翻案，为武则天翻案……这些挑战与论战是相当复杂的。无论是就其性质，还是就其所涉及的人员，莫不如此。有敌对的，有内部的，有交错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给郭沫若，给学术界，乃至

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带来的，是极有益的成果。

1927年4月，他写成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向蒋介石挑战。这是中国第一篇讨伐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它的发表，的的确确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分子的威风。有人这样回忆读了此文的震动：

“在这紧张混乱的时刻，一晚，艾思奇亲自把郭老新近写的声讨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油印本送给我看，使我受到的震动和教育极为深刻。郭老那时刚逃出了虎口，在南昌写出这一篇字字铿锵有力的历史文件，他以当时‘韬晦’在蒋介石司令部中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大量真实事实，狠狠地揭发了蒋介石阴谋屠杀广大工农，血腥镇压革命人民的丑恶嘴脸。郭老这一英勇行动，在革命与反革命拼死斗争的危急时刻，剥开了反革命头子的画皮，使不少被他蒙蔽欺骗的人头脑清醒了，眼睛雪亮了。我觉得，我自己从此开始，在政治上划出了一条界限，遇事遇人多少也能有一个倾向了。”①

这真实而朴素的回顾，代表了当年千千万万革命者的心声。

1928年开始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是一场直接关系中国人民命运、前途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郭沫若作出的巨大贡献已是众口皆碑。他随之而进行的金文、甲骨文

① 陆万美：《红梅山茶忆郭老》，见《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

刻的研究，可以说是论战的继续和深化，给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他曾如此表明了自己的心理过程：

“在这里，我想附带着叙述两件我自己的心理过程：一件是我所怀抱的挑战的意识，另一件是我所冒犯的沈溺的危险。

我要向谁挑战呢？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从前搞旧学问的人，自视甚高，他们以为自己所搞的一套是‘国粹’，年青一代人不肯搞了，因而以裂冠毁裳，道丧文敝为慨叹。因此，我想搞一点成绩出来给他们看看。结果证明：所谓‘国粹’先生们其实大多是假古董。虽然道貌岸然，而对于古代文物大多全在门外。”^①

事实雄辩地告诉人们，郭沫若的金文甲骨铭刻研究，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沉溺的危险”，且极大地振奋了自己的革命精神，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开拓性的巨著。连鲁迅先生看了也佩服地赞扬道：“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的确值得师法。最值得师法的是：他敢于，且善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清晰的思想，锐利的判决，发前人所未发，言时人所不敢言，对一代又一代学者产生着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无法估量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郭沫若一生都在挑战论战，始终处于学术论

^① 郭沫若：《金文丛考·重印弁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北京第1版。

^② 侯外庐：《坎坷的历程》。

争的漩涡中。论争，是在不同的背景、时间、地点，与不同的人物——政敌，学者，甚至战友，为着不尽相同的目的进行的。其结果和影响自然也不一样，以至在他逝世后，出现一股冲击之风。对此，黄烈同志作过很好的分析。他说：

“情况是复杂的，有学术上的是非之争，也有在学术名义下的意气之争，也不乏混水摸鱼之举。我曾与尹达同志谈了谈感想，他的有些话很有意思，他说，郭老在学术论战中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有时出语激烈，文字尖刻。在解放前他是在野的身份，解放后身份变了，但他论战的风格没有变，这就会给一些人造成压力，伤了感情，但郭老并未觉察到这一点。我很同意尹达同志的见解，我想这的确是郭老的短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郭老的可贵之处，在他的自我意识中永远把自己看作学术界的普通一员，可是现实地位和影响他又不是普通一员，这就产生了他自己预料不到的矛盾和后果。”①

我很赞成黄烈和尹达两位同志的分析。现在的问题在于：对郭沫若“自己预料不到的矛盾和后果”，我们今天如何对待？如果能够站在新的高度给以科学的总结，并引以为训，那么，对郭沫若研究，对整个学术研究，不都是十分有益的么？反之，则又会出现郭沫若的短处，造成自己意想不到的矛盾和

① 黄烈：《回忆与怀念》，见《郭沫若研究》6，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5月版。